

泰戈尔与中国

孙宜学 著

TAIGEEER
YU
ZHONGGU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泰戈尔与中国

孙宜学 著

TAIGEER
YU
ZHONGGUO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与中国/孙宜学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7-5633-5372-0

I. 泰… II. 孙…

III. 泰戈尔, R. (1861 ~ 1941) — 影响 — 现代文学 — 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2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2.25 字数:117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6 000 册 定价:16.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令人惋惜的一次文化交流

贾植芳

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总是拒绝多于吸纳，中国的落后，也一直被与这个民族性自然挂起钩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误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心理并不完全表现为保守和封闭，而一直也是开放的，像周穆王西巡会王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出使西域开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白马东来”把印度佛教输入到中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朋友，谋求与世界交流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特别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开始了让西学东渐的艰难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人面前展现的就是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文化、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与外来的刺激分不开。特别是发端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交流变成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切磋。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大胆拿来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接待西方从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基于自身所继承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把中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属于一种新的历史范畴的新文化。观察和研究中国新文化和文学运动，如果不以外国

文化、文学作为参照系,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基本品格。

要了解就需要先介绍。国外的思想学术著作车载斗量地被翻译过来,国外出现的任何新思想、学术思潮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被介绍过来,很多当时在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满怀崇敬之情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在西方历史上或现时的思想家中寻找自己的偶像,直接拜师学艺或自认为私淑弟子,如徐志摩私淑罗素,胡适私淑杜威,他们还创造种种条件,让自己的老师到中国进行游历和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思想家,而中国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借此大肆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如出过什么《杜威五大演讲》、《罗素月刊》等,而且陪同他们在中国各处游览、演讲、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这种生动的交流活动中,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思想流派,即“西化派”和“传统派”,后者也称“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是胡适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但以什么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来的新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图景就是西方文化图景。陈独秀1918年就断然宣布:“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而胡适则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很明白地指出文化折中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与此相对,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受罗素、泰戈尔的影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两种力量一直在进行着争论,在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来到中国之前就一直在进行着争论;而这些外国思想家的到来只是加剧或重新引发这样的争论而已,争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而五四以来的中国东西文化之争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之争,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国人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当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欢迎者和反对者都会不由自主地

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外国思想家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

就以泰戈尔为例,对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争论的中心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而在泰戈尔到华前,国内思想界已就这个问题争论得热热闹闹了,如著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但他的到来使这种论战更激烈起来,原因是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成某种力量的代表,甚至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梁启超、徐志摩把他当作可居的奇货,竭力以他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激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知识分子则把他看作消解人民革命意志的有害人物进行攻击,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泰戈尔的什么思想和学术。当然,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观象是受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制约的,只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总为这些本该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弄得不欢而散而深觉惋惜。

然而不容否认,这些论争客观上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民族的东西都很快会变成世界的,在人们惊叹世界如此之小的时候,在我们正加大力度搞经济建设,不断与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今天,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无论何时,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进步,但在实际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觉得难以理解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交流总是伴随着误解,关键是这些误解应该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我们研究历史、回顾历史,这就是一个主要目的。

宜学的这本书是下了工夫的,也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实际上这是研究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只是以往为人忽视而已。书中以大量的翔实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这是一项塌塌实实的研究,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都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独到的见解;在充满喧哗与躁动的今天,他还能坐下来进行这样的

学术研究,这都是让我这个文艺战线上的老兵感到欣慰的,所以当宜学让我为他的这本书写点什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希望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还肯老老实实写书,老老实实出书的研究者和出版家。

贾植芳
2004年6月

泰戈尔小传

1861年5月7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大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家族原先属于婆罗门教,后来因违反教规,受到排斥,17世纪90年代,一个叫彭乔农·库查利的族人领着家属来到恒河岸边的小渔村定居,这个小渔村就是后来繁华的加尔各答市。到泰戈尔的祖父达尔加纳德这一代,泰戈尔家族达到了最兴盛时代。泰戈尔的祖父共有三个儿子,泰戈尔的父亲是他的长子。祖父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泰戈尔家族中人。泰戈尔的父亲是一个早年生活奢侈腐化,后来转而追求真理,积极从事宗教改革的开明人物。他和妻子共生有15个子女,由于他的影响,这些子女中不乏在印度近代史上留名的人物,如大儿子是哲学家,还进行过诗歌革新实验;次子是个梵文学者,可以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作;三子是个教育家;五子在诗歌、戏剧、音乐、绘画方面都很有作为;五女是孟加拉历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泰戈尔是他的第十四个孩子,第八个儿子。

由于父亲不理家务,泰戈尔出生时,他们家已经不大富裕了,什么马呀,车呀,只是名义上存在着罢了,而能在早餐时“吃面包和香蕉叶子包着的黄油”,对泰戈尔来说已经是“登了天”的享受了。(《我的童年》)因为家里子女多,母亲无法亲自照顾这个儿子,所以童年的泰戈尔并没能享受多少母爱,而是主要和仆人们在一起。这些仆人多才多艺,有的能念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有的会编民歌,泰戈尔文学的启蒙,就

是从这时开始的。但也有些仆人又懒又谗。有个仆人为了去喝酒,就用粉笔在地下画个圆圈,让泰戈尔站在里面,然后吓唬他说,这是魔法圈,如果走出去,就会招来灾祸。泰戈尔就乖乖地站在里面,始终不敢走出去,只好望着远处的榕树出神。

事实上,泰戈尔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们是不允许走出家门的,连走遍屋子的自由都没有,他有时只好隔着栅栏窥视外面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在心里想像着这神秘的自然中包含的秘密,他像一只渴望自由却被关在鸟笼里的鸟一样痛苦。关于童年的光阴,他最常想到的是那充满在生活与世界中的神秘:“梦想不到的事物到处潜伏着,每天最先浮上心头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碰到它呢?就像自然把一些东西握在拳头里,微笑着问我们说:‘你猜这里面是什么?’”(《回忆录》)

泰戈尔要上学了。在这之前,有一次他看见比自己年长的哥哥去学校,他曾哭着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家庭教师严厉地警告他说:“你现在哭着要去学校,将来有一天恐怕你要哭着离开学校呢!”这话果然应验了。泰戈尔后来幽默地说,他平生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准确的预言!关于学校,他的印象中就只有枯燥乏味,不论是孟加拉学校,还是英国的学校,他都同样感到机械、沉闷,再加上苛苦的体罚,让小泰戈尔无法忍受,终于在14岁时退学了。家里人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但童年的泰戈尔并非没有快乐的时光。一是他在8岁的时候第一次按照韵律做诗:“立刻一朵十四音诗句的莲花就开放了,而且就有了蜜蜂飞了上来。诗人与我之间的距离开始消逝了,从那时起就一直消逝了下去。”(《我的童年》)二是他在12岁时父亲亲自为他主持的成人式;三是和父亲一起畅游喜马拉雅山,并在途中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自己说,从16岁到23岁之间,他的生活是极端放浪的。泰戈尔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幸运,首先是他处于当时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而他的家庭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适宜的艺术土壤加上他自己的灵性,他心中的缪斯终于放声歌唱了。1876年2月,在加尔各答一年一度的印度节上。15岁的泰戈尔当众朗诵了一首爱国诗,大受欢

迎,后来这首诗又发表在一家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同时出版的周刊上。诗人由此受到鼓励,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长篇故事诗《野花》,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但也是在这一年,诗人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痛苦,这一年的3月8日,他母亲去世了。他感到自己生命中的某种美好的东西永远失去了。

对泰戈尔来说,187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泰戈尔的创作在这一年获得了第一个丰收。他在这一年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女乞丐》,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怜悯》,一部无韵历史诗剧《鲁德尔昌德》,一部长篇无韵故事诗《诗人的故事》,一组古歌《太阳组歌》,还有一些诗歌、散文、论文等。这些作品贯穿着诗人对理想的向往和对新生活的热爱,只不过他这时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模仿的痕迹很重。

泰戈尔这时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但在当时的印度,文学创作尚不能成为一种职业,鉴于此,诗人的二哥建议他到英国去留学,这样将来或许能当个文官,或者律师,父亲也同意。1878年9月,泰戈尔途经意大利、巴黎到达伦敦,进伦敦大学学习,广泛阅读了英国和欧洲的文学作品,并写了不少文学研究论文。然而,当他刚刚摆脱对伦敦恶劣气候的不良印象时,他的二哥要回国了,家里人因为不放心他一个人在伦敦,就让他也回国。1880年2月,他不得不结束自己17个月的海外生活,返回印度。对这段生活,他后来总结说:“我在大学里只念了三个月,我的外国的知识差不多全是靠同人接触得来的。”(《我的童年》)

回国之后,诗人诗兴大发,先是完成了在伦敦就已动笔的长篇诗剧《破碎的心》,随后在1881年写了两部根据《罗摩衍那》创作的音乐剧《蚁垤的天才》和《死的狩猎》,而在诗歌方面,诗人这时期的最大成就是1882年出版的一部组诗《暮歌》,其中的诗歌充满了热情的浪漫的幻想以及忧郁的悲哀的情调。这是诗人第一部充分体现了自己特色的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东西,所以,他说在自己写诗的历史中,这个阶段是最令他留恋的。对诗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形式更高兴的事呢?

如果说《暮歌》标志着诗人早期创作的结束,那么1883年出版的诗集《晨歌》则意味着诗人成熟期的开始,热情、开朗代替了早期的忧郁和

悲伤,诗歌的韵律也更加熟练。在这期间,诗人还在五哥的帮助下成立了孟加拉第一个文学团体,准备用科学方法整理孟加拉文,可惜没过多久就失败了。但这是泰戈尔从事社会活动的开始。这一年的春季和雨季,诗人移居印度西南沿海城市卡尔瓦尔。在这里,他创作了歌剧《大自然的报复》(中、英译本为《修道士》),这是泰戈尔第一部成功的剧作,他自己称这部作品是他“未来的全部创作的入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阐明了我的一切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在有定的界限内达到神的境界的欢悦”(《回忆录》)。剧本否定了消极遁世思想,肯定了现实世界,这也是泰戈尔一贯的生活态度。

同年秋天,泰戈尔回到加尔各答居住,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家里已经给他找好了一个11岁的妻子。新娘相貌平常,但很善良。父亲这时还让他担任梵社秘书,以锻炼他的实际工作能力。

在此后的几年里,泰戈尔继续以充沛的激情创作着,如剧本《诺丽妮》(1884)、诗集《画与歌》(1884)、短篇历史小说《王冠》(1885)、以历史故事为原型的小小说《贤哲王》(1885)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音乐喜剧《幻影的游戏》。但其中最能代表泰戈尔此时心境和成就的是诗集《刚与柔》(1886年动笔),这部诗集形式多样,主要内容是抒发生活的欢乐和对生活、对现实世界的热爱之情,如第一首诗就这样写道:

我不愿舍弃这美丽的世界,
我愿同光辉的太阳在一起,
我愿同盛开的鲜花在一起,
我愿同人们生活在一起。

1889年至1890年,泰戈尔是在不断迁徙中度过的。据说泰戈尔有个习惯,一旦心情不好,就要出去旅游,而每次都会产生伟大的作品,这次也不例外。他这次外出期间共创作了三部重要作品,即无韵诗剧《国王与王后》(1889),主要表现个人爱情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冲突;《牺牲》(1890)主要抨击了为迦利女神供奉牺牲的野蛮习俗,以及诗集《心中的

向往》(1890)。

1890年8月22日,泰戈尔和二哥一同出发到英国旅行,在伦敦时,他的生活倒也相当愉快,但却写不出什么作品。同年10月,他突然决定回国。第二年,他把自己在旅英期间写的日记以《一个欧洲旅行者的日记》为名出版。

旅英归来后不久,他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即接受父亲的命令,接替大哥管理家业,刚开始他很不乐意,但不久他就发现在这种工作中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接近自然,欣赏农村美丽的风光。这期间,他还制定了一个农村开发计划,目的在于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培养自立精神。这段生活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这一时期,他也写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如《河边的台阶》、《邮政局长》、《喀布尔人》。不过这时期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如《吉莉芭拉》、《弃绝》、《摩诃摩耶》、《素芭》,在这些作品中,他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罪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对受尽摧残的妇女表示了同情。

从1894年开始,泰戈尔在写短篇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好几部诗集,比较重要的有《金帆船》(1894)、《微思集》(1896)、《缤纷集》(1896)、《收获节》(1896),以及长诗《川》,这些诗或表现了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或歌颂了美与爱,不少孟加拉人甚至认为这些诗代表了泰戈尔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除了诗和短篇小说之外,这一时期诗人还创作了不少有代表性的剧作,主要包括抒情剧《齐德拉》(1891)、社会生活喜剧《第一个错误》(1892)、有韵抒情诗剧《临别的诅咒》(1892)和《玛丽妮》(1896)等。在散文创作方面,诗人同样卓然不凡,其中最特色的是1897年出版的《五元素日记》,在这部散文集里,作者把“风”、“地”、“水”、“火”、“空”人格化,探讨文学和生活中的诸问题,风格幽默;而1899年出版的《碎片》,则是箴言、警句和小故事的集锦,深受人民的喜爱。

1898年,泰戈尔的生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年的2月,英国政府通过了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治安维持法案,孟加拉人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抗议,诗人也以满腔热情,通过演说和实际的抗议活动,投身于这场民族运动,成为群众爱国运动的坚强鼓舞者和实际参加者。与

此同时,诗人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一个人无忧无虑地享受田园生活,他必须负起维持家庭和教育孩子的责任,他迫切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定居下来,最后他选中了桑地尼克丹,意即“和平之乡”,于是就和妻子以及五个孩子来到这里。在这里,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上去。他反对现存的教育体制,一直认为必须创办一种森林学院式的教育机构,以把印度古代的教育理想和现代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根据这种教育思想,1901年12月22日,他在和平之乡创办了一所学校,开学的时候只有五个学生和五个老师。但这个实验遭到了来自各方面力量的反对。守旧派攻击他亵渎印度教教规,因为五个教师里有三个是基督教徒,其中还有一个是英国人;而改革派则攻击他留恋过去,不肯前进,但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伟大的,根本不为所动。为了克服资金短缺带来的严重困难,他变卖了一部分房产和藏书以及妻子的首饰来维持学校。并且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中,把他的爱献给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生活,还亲自为他们编写了教材。

在创作方面,1900年他先后出版了两部诗集《故事诗集》和《故事集》,这些诗集中所收诗的基本主题是反对异族侵略,反对封建暴政和宗教陋习,赞美人们高尚的人格。另外,在1900至1901年之间,他还写了三部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诗集,即《梦》、《瞬间》和《奉献》,这些诗,或者以轻松活泼的格调歌唱自然和生活的美,或以庄严肃穆的想像歌颂诗人心目中的神。在小说创作方面,这一时期他写了中篇小说《破裂的家庭》(1901),和以孟加拉中产阶级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小沙子》(1903),这部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印度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泰戈尔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且把孟加拉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02年,诗人趁热打铁,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沉船》,这部小说先是在1903年4月和6月间在报纸上连载,1906年正式出版。小说仍然是以孟加拉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和婚姻问题为主题,对印度的现实社会生活也进行了精确的描写,但由于作者有意要娱乐读者,而且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难免减弱了小说的批判色彩。其中主人公的软弱性格,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印度民

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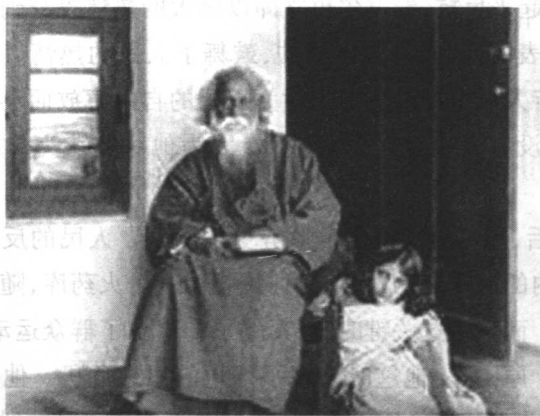
在和平之乡住了不到一年,泰戈尔的妻子就得了重病,后虽移居加尔各答就医,但无济于事,于1902年11月死去。虽然刚结婚时泰戈尔说不上爱她,但与泰戈尔在一起的日子里,这位贤惠的妻子靠自己的辛劳和勤奋,最终赢得了泰戈尔的爱。在她生病的日子里,泰戈尔不分昼夜地亲自照顾她,不舍得交给护士护理。妻子死后,他非常伤心,接连写了27首诗,于第二年以《回忆》为名结集出版。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泰戈尔的13岁的二女儿也因病去世了。

1905年,印度总督颁布了分裂孟加拉的法律,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反抗,泰戈尔也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群众运动中去,他发表演说,谱写爱国歌曲,鼓舞了人民的热情。但这些歌曲主要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的赞扬,并没有直接谴责殖民主义,因为他一贯认为爱国不应该排斥。

1906年后,印度的政治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人民的反抗最终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整个孟加拉就像一个火药库,随时都可能发生武装起义。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泰戈尔却退出了群众运动,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原因是:他这时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危机。他希望印度独立,但反对为此而不惜一切代价,他希望把群众运动引导到自己设计的改良主义道路上去,如建设农村,改革教育,等等,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这种主观幻想却不会实现,甚至受到了印度群众和殖民政府的双重攻击。他苦闷、孤独,但并不改初衷。

就在诗人政治上感到极度孤独时,新的家庭不幸又降临到他身上,1907年,他的年仅13岁的小儿子又患病死去。在1902—190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泰戈尔接连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真是痛苦之极。而活着的三个孩子中,长女生活在外地丈夫家,大儿子在美国留学,三女儿刚刚结婚,他真正成了一个孤独的人,但孤独并没有妨碍他创作。从1906年到1911年之间,他写了很多关于国家、社会、教育、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史、民间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文章,而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于1907年至1909年之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戈拉》和《秋节》、《暗

室之王》、《邮局》等几部剧本。《戈拉》热情地歌颂了先进的正统派新印度教徒炽热的爱国感情和对祖国解放的坚定信念,同时有力地批判了他们的宗教偏见、种姓观念以及复古倾向,指出应该面对现实,真正为祖国服务。然而真正能够抒写泰戈尔此时内心的苦闷和孤独的还是他在这期间写的抒情诗,以及许多宗教意味非常浓厚的神秘诗,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采果集》和《爱人的赠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世的。《吉檀迦利》所收的诗都是泰戈尔1909年和1910年之间写的,贯穿整个诗集的中心是爱,这个爱,既包括爱神,也包括爱现实世界,语言质朴无华。



泰戈尔和孙女在一起

1911年,诗人还写过一首著名的歌曲,名为《人民的意志》,表达自己希望祖国统一、民众团结、民族觉醒的愿望,印度独立后,这首歌曲被定为国歌。也就在这一年,泰戈尔写出一本《回忆录》,对自己50年的道路作了总结。

如果在这之前的泰戈尔还只能称为印度的泰戈尔的话,1912年后的泰戈尔则可以称为世界的泰戈尔。他本计划在这一年的3月旅欧,但因为突患重病而不得不推迟。在修养期间,他着手写了很多宗教歌曲,后结集为《歌之花环》出版;同时他还着手把《吉檀迦利》翻译编辑成英文诗集,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想换一种方式重温过去时日里的欢乐时光。同年5月27日,泰戈尔带着儿子、儿媳出发旅英。在

伦敦,他先拜访了英国画家威廉·罗萨斯坦,并把英文的《吉檀迦利》交给了他,后者读后深受感动,并给著名诗人叶芝写信,叶芝读后也同样感动。6月30日,罗萨斯坦在自己家里举行集会,请叶芝和几位著名诗人朗诵泰戈尔的诗,这个晚会开得非常成功。泰戈尔这次在英国停留了四个月左右,还会见了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

10月,泰戈尔前往美国,并到哈佛大学用英文进行演讲。同年11月,《吉檀迦利》英文版在伦敦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和印度,很多人不相信泰戈尔会写出如此优美的英文诗歌。泰戈尔的名字响遍了英美诸国,美国学术界以及其他团体纷纷向泰戈尔发出了邀请。1913年1月,泰戈尔应邀到达芝加哥,作了题为《印度古代文明之理想》、《恶的问题》等演讲;随后又到罗切斯特出席“宗教自由主义者会议”,紧接着又到波士顿讲演。所到之处,都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这些演讲集后来以《生之实现》为名出版。1913年4月,泰戈尔自美国赴伦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同年9月,他自英返回印度。

1913年11月13日,《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传到了和平之乡。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度人奔走相告,贺信和贺电雪片般飞来,但诗人对印度社会的这种热烈反应并不领情,就像他在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受奖所引起的社会兴奋旋风是可怕的。那简直就像狗尾巴上拴个白铁罐的恶作剧,狗一动就发出唧唧唧的响声,围上来许多起哄者。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之前印度人对他的诗歌是赞者少,抨击者多,现在看到他得了诺贝尔奖就马上跟着唱赞歌,他感到受了屈辱,所以,当1913年11月23日加尔各答各界知名人士五百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来到和平之乡向他表示祝贺时,诗人再也忍不住了,拒绝接见他们。同年年底,加尔各答大学举行特别仪式,授予泰戈尔博士学位。不管怎样,这一年是泰戈尔最为活跃的一年:英文的《吉檀迦利》获奖,《园丁集》、《新月集》也在这一年出版。泰戈尔此时可以说已经名扬世界!

《吉檀迦利》共有103首诗,主要是从他以前的诗集里选译出来的。“吉檀迦利”的意思是“奉献”,其中的诗是献给作者心中的神灵的,集中体现了诗人的泛神论思想。诗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主

宰宇宙万物的是一个无形无影而又无所不在的精神本体：神，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分身”，只有与神达到完全和谐的境地，人才能真正感到快乐。这部诗集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对这个神的追求和向往，以及实现了这个理想后的欢悦。需要说明的是，诗人心目中的这个神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是在“最贫贱最失所的人群”中的，所以诗人反对超脱现实，而是要在现实中寻找神，追求神人的统一。《园丁集》共收诗 85 首，以欢快明朗的基调，表达了男女之间热烈的爱情；《新月集》共收入 37 首儿童诗，这些诗描绘了儿童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以及纯洁美好的母子之爱。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向喜爱和平的泰戈尔对这场战争同样是深恶痛绝的。也与往常一样，这个不幸的消息使得本来正非常愉快地度假的泰戈尔一下子心情烦躁起来，他不能再安心地住在一个地方。也像过去心情郁闷时一样，他只有靠不停变换住所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他在给和平之乡的学生谈到这次战争时说：这场战争犹如一个人的胸部受伤而四肢感到痛苦，父祖之罪由儿孙承担一样，地球上任何人犯了错误，其他地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就在这种极度的痛苦和惶惑中。诗人又写了不少的诗歌，以表达自己变幻不定的心情，于 1916 年结集出版，即《雁之飞翔》；同年他还出版了两册歌曲集《歌之花环》和《歌束》，并且为和平之乡的孩子们写了一部优美的幻想剧《春之循环》，贯穿全剧的基本精神是动的精神：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变化的，都是有生命的，都是运动的，我们必须和生命一起前进，这个剧本后来在和平之乡和加尔各答两处上演，作者自己亲自扮演了其中的两个角色。同年，泰戈尔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最重要的是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信》、《不相识的少女》等。

1915 年 2 月，甘地来到和平之乡访问，可惜泰戈尔当时不在这里，两人未能见到。一个月后，甘地第二次来访，这两个印度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终于见面了。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培养的学生也明显不同：甘地的学生古板严肃，像圣者一样，而泰戈尔的学生则天真活泼。甘地对和平之乡的工作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建议和平之乡的师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不应雇佣工人，泰戈尔接受了这个建议，从 3